

“七夕”特别报道

“七夕”即将来临,毛国强的婚纱摄影工作室特意推出“遇见军恋遇见你”公益拍摄活动,通过征集军恋故事和情侣照,为5对恋人拍摄军旅主题婚纱和情侣艺术照。

2019年2月,退役军人毛国强辞去公职,和3名退役战友创办了一家军恋主题婚纱摄影工作室。1年多来,他们已为160多名战友设计拍摄

了写真和婚纱照。

“每组军旅婚纱照的背后,都有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他们根据每名战友的婚恋经历定制拍摄方案,同时,也屡屡被一个个关于坚守与奉献的军恋故事所打动。

“当过兵,才知道军人的爱情有多么不容易。”毛国强曾在驻疆部队服役8年,他感触最深的就是军嫂来

队探亲的场景。她们孤身乘坐飞机、火车和汽车,辗转几千公里来到哨所,为的只是和爱人短短的相聚。

“军人的爱情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有位诗人说过,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新美如画。我们希望用别具一格又意义非凡的婚纱照向军人的爱情致敬,用镜头为战友留下他们美好真挚的军恋时光。”毛国强说。

定格,军人的爱情

■王子冰

约。”这句来自老班长夏波的鼓励,让毛国强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夏波驻守在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边防连。他曾送给妻子廖蕾一条红裙子,但因为两地分居,休假也总错开执勤任务重的夏天,直到结婚前夏波也没机会见妻子穿。那年冬天,廖蕾去探亲,凛冽的寒风中,她穿着一袭红裙惊艳了整个哨所。

“每段军恋可能都有苦涩,却也有着独一无二的甜蜜。”毛国强说。前不久,一位年轻的军嫂来到工作室,她的丈夫驻守在西藏,两人领了结婚证却一直没拍婚纱照。她想去丈夫的驻地拍婚纱照,但一直没找到愿意前去的摄影师。

几千公里的路程、5000多米的海拔让毛国强犹豫了。后来,是这名军嫂手机里展示的一段新闻视频打动了他们:一名战士巡逻途中休息时摘下头盔,头盔里藏着他 and 爱人的结婚登记照。记者问他有什么遗憾,他坦言领证太匆忙,还没来得及跟爱人拍一套婚纱照……

“视频里的战士正是她的丈夫,她去探亲想给他一个惊喜。我们能不能帮战友完成这个心愿呢?”工作室成员一致决定,哪怕往返路费自掏腰包,这件事他们也要去做。

8月12日,摄影师陆建军自费乘飞机飞到拉萨,次日乘车翻越了两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山口,抵达西藏军区某边防团,第三日终于赶到连队,给这名年轻的军嫂刘雨和她的丈夫、战士秦永臻拍摄了婚纱照。这一次拍摄,为期7天,往返6500公里,但陆建军和工作室的战友都觉得值得。

作为一名曾经的基层部队新闻报道员,毛国强的手机壁纸是一张流传甚广的照片:照片中一对恋人在告别,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使军人的耳朵冻成了灰白色,滚烫的泪珠流到面颊凝成晶莹剔透的冰珠……这一幕发生在红山嘴边防连,一个封山期长达半年之久的边防哨所,和毛国强曾经驻守的哨所同属一个大单位。那张新闻照片一度是毛国强从事新闻拍摄的精神动力,如今则成为他们坚持拍摄军恋的信念所在。

“军恋的动人之处,在于它背后都有一个特别的故事”

5月3日,一列成都开往德阳的火车上,毛国强翻动着面前修改了无数次的剧本,蹙眉思考着拍摄行程。成立摄影工作室以来,节假日是他和同事最忙碌的时候,前来拍摄的战友或军嫂大都时间有限,需要在最短时间完成定制拍摄,有时一天要辗转上百公里取景。

“军恋的动人之处,在于它背后都有一个特别的故事。”对于工作室来说,为战友们拍婚纱照不只是拍一组照片那么简单,他们更想记录下一段段与众不同的军恋故事。所以这个团队里不仅有摄影师,还有导演、编剧和配音演员,他们希望拍摄完成的每套婚纱照,都能成为一部讲述军人爱情的静态电影。

一名安徽籍的钟排长与恋人相识在机场候机室,又重逢在同一个机场,妙不可言的缘分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工作室便根据他们的故事编写了剧本《比翼》。军嫂拿到相册时,看到每张照片下面的“台词”备注爱不释手:“这是一份珍贵的礼物,拍下的是我们的幸福时刻,记录的是一生难忘的军恋时光。”

随着工作室的名气越来越大,老兵们的工作也变得多样起来:退役战士小汤想为女友组织一场求婚仪式,于是摄影棚变成求婚现场,老兵们成了小汤的“助阵战友”;一家三代从军的志愿军老兵想拍一张军装“全家福”,大家带齐设备上门拍摄,并把装裱好的照片送到志愿军老兵手中;征兵结束后,他们为参军入伍的有志青年拍摄“从军照”,老兵退役前,他们为离队老兵拍摄“留念照”……

“一朝从军,终身是兵。虽然离开了军营,但这份军旅情怀不会忘记。”毛国强说,带着这份情怀去拍摄军人的家国情怀,军人的高大、军恋的美好就会呈现在每一张照片里。

图①、②:工作室把军恋故事融入拍摄中;图③:毛国强在为军人情侣拍摄;图④:工作室为战友举办的求婚仪式;图⑤:工作室为志愿军老兵拍摄的军装“全家福”。

作者供图

(合成:扈硕)

最美退役军人

夏日的和田,烈日炙烤。路边洼地,一名身着迷彩服的中年汉子,正手持铁锹为绿化带铺土,汗水从他的脸颊不停滴落。看到我们前来,他拍了拍身上的泥土,热情地打招呼:“不好意思让你们找到这里,一会儿尝尝我亲手种的香茶!”

眼前的汉子叫高自威,黑乎乎,壮实实,挺拔的身姿依稀能看到军人的影子。自从18岁入伍来到武警兵团指挥部第八支队,他就与和田结了缘,再没离开过。

和田风沙大,那时常在外巡逻的高自威总会在漫天风尘中变成一个“土人”。戈壁滩上,每次有绿皮火车从他和战友身边经过,都会鸣起响亮的汽笛,那是在向军人致敬。每当这个时候,高自威就高兴得像个孩子,不停地朝火车挥舞双手。

在和田当兵的8年,听着“沙海老兵”故事成长起来的高自威,亲眼目睹了和田日新月异的变化。2012年退役时,高自威没有回到素有“塞外江南”之称的家乡新疆伊宁,而是选择继续留在和田。家人得知后反复劝说他,高自威头一低,又一扬:“我的青春在和田,和田比伊宁更需要我。”

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四师后,从派出所协警到民兵连民兵,高自威一步一个脚印,干得扎扎实实。当选连队党支部书记,他就说了4个字:“我能干好。”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帮助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高自威在基层工作岗位延续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2015年,麦提敏·阿卜杜克热木一家四口从皮山农场转移安置到二二四团五连。时任副连长的高自威主动和他们结了亲,把麦提敏一家视同自己的亲人。

几年来,为帮助“哥哥”麦提敏一家增收致富,高自威想了不少办法:庭院养殖,他亲自选饲料学饲养方法,养出来的兔子和鸽子又大又肥;红枣种植,他挑肥料选农药,种出来的红枣又大又甜。后来,麦提敏在团部住上了楼房,还买了辆小轿车。如今,麦提敏逢人就说:“我的弟弟‘亚克西’,是共产党派来的好干部。”

不只是麦提敏夸赞“弟弟”,提起高自威,连队的职工群众也都会竖起大拇指。2018年,高自威高票当选五连党支部书记,成为连队近千名各族群众的领路人。

前些年,连队的枣园种植雇佣工人比较随意,经常是到路边招呼一些想找工作的工人,50元干一天。高自威担任书记后,坚决制止了这种做法:“这么干会对安全生产造成隐患!”他带着连队干部和职工到周边乡镇政府商谈长期合作,为当地贫困户提供工作机会,并和他们签订劳务合同,购买人身意外保险,保障合法权益。这几年,共有168户贫困家庭通过在枣园工作增加收入近700元。

红枣丰收了,就要找销路。连队综合改革后的一段时期,红枣市场不景气,效益直线下滑。望着堆积如山却卖

■贾广宇 祁文文 本报特约记者 黄宗兴

扎根戈壁滩的『胡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二二四团五连党支部书记高自威尽心服务基层

不出去的红枣,不少职工在自家枣园抹起眼泪。

为了让大家抱团取暖、共同富裕,高自威带领连队“两委”及一些党员、职工牵头成立了红枣专业合作社。依托合作社,高自威四处联系企业收购红枣,签下订单,帮助职工解决卖枣难的问题。辛苦劳动换来实实在在的收入,职工们别提多高兴了:“有了红枣合作社,我们的日子就有盼头了。”

高自威爱琢磨,光靠种植业、养殖业,群众增收的渠道还不够多。2019年,高自威向团党委请示,在五连建设“双创”发展园,规划设计五连商业区。如今,1000多平方米的8间门面房已经建好,职工群众在生产生活便利的同时增加了收入,五连也成为团场综合配套改革后的连队经济发展示范区。

临别时,高自威热情地说:“你们10月份再来,那个时候红枣熟了,我请你们吃‘红枣宴’。”夕阳斜照在高自威身上,他的身影越来越长,就像一棵挺拔的胡杨。

抗战老兵耿淑明当敌后武工队队长的日子——

“敌后神八路”的抗战往事

■刘汝山 董 坤

甘将热血沃中华·探访抗战老兵



说起武工队,许多人都会想到电影《敌后武工队》。这部电影讲述的是机智勇敢的八路军武工队在冀中平原与日寇斗智斗勇、浴血奋战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尤其是武工队长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形象,让人过目难忘。

生于1918年的抗战老兵耿淑明就是这样一位武工队队长。他带队抗击日寇的经历,比电影中的演绎更加精彩——15岁担任地下交通员,18岁拉起80多人的队伍参加八路军,21岁担任敌后武工队队长,炸碉堡、毁铁路,歼日寇、除伪顽,被群众誉为“敌后神八路”。

如今,百年的风霜洗礼,在老人脸上刻下岁月的痕迹。躺在病床上,头发花白的耿淑明微微睁开双眼,眼睛慢慢放出光来,目光温润。他用力地缓缓抬了抬手,向前来探望的我们打了个招呼。

因身体原因,老人不便多言。在一旁照顾他的儿子耿兵从小听着父亲的战斗故事长大,从他的口中,我们听到了老人当年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虽无法言说,耿淑明一直在侧耳倾听,神情专注,似乎随着儿子的讲述,他再度回到了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

1933年5月,正在读高小的耿淑明,在两位老师的介绍下,毅然加入反帝大同盟。“那1年多时间里,在父亲影响下,先后有20多名学生加入反帝大同盟,并且动员建立起一支80多人组成的革命武装。”耿兵谈起父亲充满自豪,“他带领这支队伍多次袭击汉奸武装,令当地汉奸伪军闻风丧胆。”

1937年,“七七事变”后,耿淑明带领的抗日武装被编入八路军115师独立团。当年9月25日,平型关战斗尚未打响前,115师独立团奉命在河北涞源通往山西灵丘的交通咽喉驿马岭阻击日军。

“父亲带领连队和其他连队一起坚守阵地4个小时,连续击退日军一个联队的多次进攻,圆满完成阻击任务。因与上级联系中断,撤退路线被切断,父亲果断指挥连队正面突围,把部队带进蔚县南山。两周后,他带领连队归队,途中还袭击伪军一个小队,俘敌11人。”耿兵说,“这场完胜受到团长杨成武的高度赞扬。”此后,耿淑明跟随独立团奋战在太行山麓、易水河畔,粉碎了日伪军对冀中地区的多次“扫荡”和“蚕食”。

1939年2月,耿淑明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被任命为徐水县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1年后又被任命为定易徐涿游击支队政治委员,肩负起率领武工队挺进敌后开展武装斗争的重任。“当时保定地区军事斗争形势非常残酷复杂,之前被派去的7任武工队队长全部牺牲。”面对复杂的斗争形势,耿淑明变被动为主动,直接住进地主、伪保长甚至汉奸家,以过人的智谋和胆略,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配合下,通过偷袭、组织围歼等灵活机动的方式,狠狠打击了日伪顽敌人。

1940年9月,百团大战进入第二阶段。八路军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广泛的交通破袭战,并摧毁日军深入抗日根据地的主要据点。当时22岁的耿淑明想干一件不寻常的大事,去炸一列火车,却苦于没有炸药。“既然是炸敌人的火车,自然还得用敌人的炸药。”耿淑明灵机一动,派人四处搜寻日寇丢弃的未爆炸的炸弹,自制成炸药包,将挂着的炸药包的木棍捆在铁道旁的高梁秆上,以免引人注目。

深夜,冷风萧瑟。耿淑明和战友埋伏在铁道旁,终于等到远方传来火车的轰鸣声。日寇虽然打开了车头的探灯,但只看到伸进铁轨的一簇高粱秆。火光一闪,一声巨响,日寇的火车头被炸成了一堆废铁。“之后父亲得了一个奖章,就是一块白布包上一个铜板,上面写了个‘奖’字。父亲说他当时激动得好几天都

没睡好觉。”耿兵说。

耿淑明越战越勇。1940年初冬,他带领两名队员在山西省繁峙县横涧村执行任务,遭遇用毛驴驮物资的七八个日军。见敌人人多,耿淑明计上心来,让另外两名队员隐蔽在角落里先打两枪,他在旁边再开几枪。一个“声东击西”,把几个日军吓得惊慌失措,扔掉毛驴调头就逃。“那一次他们不费一兵一卒,缴获了日军大量的皮鞋、棉衣等物资。”

百团大战期间,耿淑明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就像《敌后武工队》电影里说的那样,“好戏连台”。在山西省大同市阳高县东团堡村,耿淑明一行7人,发现一个日军带了十几个伪军正准备在村里据点。他们请一个老乡带路,绕着喝得醉醺醺的伪军,直接冲进据点把正在睡觉的日军捆了出来。

耿淑明还曾化装成女工进入敌据点将敌队长击毙,也曾化装成劳工将伪军一个小队全数缴械……“日军曾悬赏100块大洋要他的人头。”耿兵说,“父亲和战友在保定地区建立‘野平’抗日游击队,敌人一听到‘野平’的名号就彻夜不宁。”

1951年1月,耿淑明被任命为63军187师参谋长。1个月后,187师奉命入朝作战。在第五次战役后期,63军为遏制“联合国军”的进攻,在朝鲜遂川、铁原地区进行了异常艰苦的阻击战。耿淑明指挥部队以游击战法打阵地战,指挥187师“昼失夜反”,在阻滞敌军的同时



不断组织反击,如同一颗钉子一样死死地铆在阵地上。

“那一仗,63军以伤亡2万多人的代价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父亲一生不写回忆录,就是不愿回忆那段日子。牺牲了那么多的战友,他非常痛心。”耿兵说。

翻看耿淑明保存的两本相册,里面的照片记录的都是他在战场和训练场一线的身影。看到一张耿淑明拿着步枪狙击瞄准训练的照片时,耿兵特意介绍道:“这是当年山西省军区开展武器装备技术革新活动,在老式步枪上加装瞄准镜改进成狙击步枪,父亲作为司令员和在训练处处长检验训练效果。父亲说过,身上千钧重担,身后千军万马,

现在不打仗,更要把训练场当成和平年代的战场。”

2017年8月,儿孙们为耿淑明过虚岁百寿寿辰。寿宴上,儿孙们问老人家,“一生中最高兴的事是什么?”耿淑明毫不犹豫地说:“打胜仗!”

这是作为一名军人的至高境界,也是耿淑明一辈子追求的人生信条。

(编者注:编辑完成此稿后获悉,耿淑明因病于2020年8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谨以此文,向这位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致敬。)

上图:革命战争年代耿淑明(左二)和战友合影留念。 作者供图